

# 原典、诠释与哲学的成长

——读李承贵教授《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

杜运辉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6-0119-04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是经典诠释与理论原创的互动融合,学者们在理论预设、思想参照、研究方法、价值判定等诸多论域对中国传统哲学经典进行了富有个性的多彩追寻。时至今日,如何准确诠释中国哲学的本真意涵和理论价值,如何继述先哲精义而在回应时代问题中推进思想创新,仍然是中国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主的重要课题,这在学界对“以西释中”和“以中释中”等诠释范式的热烈讨论中可见一斑。可喜的是,李承贵教授的大著《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诠释之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借鉴。

初读该书,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其问题意识之鲜明与一贯。李承贵教授认为“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运动,最大特征之一是解释的韧性及穿透力量”<sup>[1]</sup>;通过诠释,“可以将传统哲学的意义或价值发掘出来,“可以使传统哲学与当代社会生活发生连接和互动,“可以使传统哲学实现自我调整和丰富发展自己。”<sup>[1]345-346</sup>他在最近二十余年的思想生命历程中,紧紧抓住“哲学解释方式”这一核心话题,力图在“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之双向互动中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智慧和思想特质,随之而展开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方法、解释实践、现代身份和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探讨,对当代中国哲学诠释学做出了重大推进。

对《道德经》《论语》原典比较及“德”“智”关系、

儒佛道三教关系,李教授认为儒道两家虽有显著差异,但也有“不争”“俭朴”“报怨”“均平”等方面的相近乃至一致。因而,他反对“将某个学派思想的基本特征扩大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主张“对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sup>[1]31</sup>以揭示其共性。这种卓见,可谓破斥某些学者“儒教是中国文化和文化文明的载体”,把中国文化描述为从伏羲以来就存在的儒教文化的儒教史观之清醒剂。他认为,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之间既有“相容相摄”的顺向开展,也有“相拒相斥”的逆向开展。前者如儒学汲取印度佛教思想而建构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和境界论,又如佛教借鉴中国本土道家的范畴、命题、运思方式和儒家的入世精神、伦理思想而不断中国化;后者如三教在伦理价值、社会功能、文化地位等方面之冲突。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哲学正是在“相容相摄”与“相拒相斥”之相反相成中展开了相对宽松、自由、平等的讨论争鸣,拓展了论域,丰富了义理,实现了融合与创新。在考察了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张东荪等前哲的基础上,李教授提出中国哲学具有研究对象上的“重人不重物”、思维方式上的“偏重直觉体悟”、学术旨趣上的“崇尚经世践行”、解释理路上的“遵奉生命生机”、建造境界上的“追求中和圆融”等特质,而以“生命”为研究对象则是这些思想特质形成的根本原因。进而,他主张中国哲学要在“立足自我、迎接新知、新旧相用”中实现特质保护与现代转型之统一。笔

〔收稿日期〕2017-08-0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张申府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16AZX013)。

〔作者简介〕杜运辉(1974—),男,河北深泽人,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者认为,这种论断是富有辩证精神的,与张岱年先生“将来的中国新哲学,固然必是西洋哲学影响下的产物,而亦当是中国旧哲学之一种发展”<sup>[2]706</sup>相契合。作为“一家哲学”的中西方哲学,与“一般哲学”都是“范型”与“类称”、“特例”与“总名”之关系,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判中国哲学,也不能过于渲染中国哲学的“普世性”而重蹈华夏文化优越论之旧辙。不仅如此,如何在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映照下呈现中国哲学的民族智慧,更是今天中国哲学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尤其需要我们严肃对待。张申府、张岱年先生首倡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和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之路的重要参照。如杨海文教授所说,只有在“心态平等,彼此尊重,特别是尊重各自的差异性”的理性对话中,“一幅‘中体、西用、马魂’的壮观历史图景才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sup>[3]</sup>。

该书对王国维、胡适、熊十力、贺麟、张东荪、冯友兰、牟宗三、方东美等中国哲学史大家的诠释实践,都作了仔细考察。李教授把方东美诠释思想高度提炼为:“被认知对象之内容和特点是选择认知方法的前提”“西方哲学方法不宜机械地用于中国哲学研究之中”“知识论、逻辑学方法用于理解中国哲学需特别慎重”“自然科学方法可能导致中国哲学去生命化”“自身思想文化系统是解释中国哲学的基础”“形上学方法是与中国哲学相契的方法”<sup>[1]123-129</sup>六方面,既对此表示了较大同情,又持守一种客观的独立判断立场。如他在反思科学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后,认为中国哲学既有“非物质化”“非数量化”“非心理化”“非定义化”“非知识化”等人文性,也有科学性和社会性,因而科学方法固然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有其限度和边界,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据具体的对象而使用适合的方法,而不能勉强地使用不相应的方法”<sup>[1]84</sup>。李教授认为,解释中国哲学要坚持立足自我文化系统的“返乡原则”、立足引入新坐标的“开放原则”、立足主客之对应的“相契原则”。他在考察科玄论战后提出:“研究方法的应用,首先必须对被研究对象的内容特征有个较准确、较全面的把握。”他比方东美等前贤更多地、更显著地表现了对多种方法的客观评价,认为“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由于它们的视角各异、侧重不同,因而在人生观问题的解决上都会有所助益……三大研究方法各有其存在根据与价值”<sup>[1]107-108</sup>。依据中国哲学的自身内容和特点而选择恰当的诠释方法,笔者

对此深为赞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开宗明义就提出“中国哲学研究,应先辨识中国哲学之其基本倾向”<sup>[2]1</sup>,即要充分关照中国哲学“不作非实在的现象与在现象背后的实在之别”<sup>[2]2</sup>“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sup>[2]5-9</sup>,及“人生理想论之最大贡献是人我和谐之道之宣示”<sup>[2]707</sup>等“基本倾向”“根本态度”或“根本倾向”,如此乃可避免以西方哲学或印度哲学来误会中国哲学;同时,要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识取中国哲学之本来面目,也需运用逻辑解析法以确定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之确切意谓、运用辩证法来考察中国哲学之原始与流变的发展历程。因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既要重视切身体验(体悟、体认)和践履工夫,也要充分尊重解析、辩证等方法之“存在根据与价值”。

李教授还考察了张岱年先生的诠释实践,认为张先生发掘了“理”的多种意蕴,但这种以唯物论为主线的诠释“否定了‘理’的超越性。……唯物化容易导致肤浅化。……唯物化容易导致片面化。概言之,唯物化方式释‘理’,虽然有其独特意义,但显然无助于全面、准确把握中国哲学中‘理’的内涵。……‘理’的意义世界应予肯定和保护。……‘理’的本体义、人伦义被张岱年所忽略。……‘共相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需要肯定的”<sup>[1]256-257</sup>。对此,笔者认为尚需作进一步考量。张先生1933年在《谭“理”》中区划“理”之“形式”“秩序”“所以”“规律”“当然”五种意谓,1935年在《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则概括为“宇宙之秩序或自然之规律”与“人事之规范或当然之准则”,而人伦之“理”只是“求生之充实、生之圆满,而不得不遵循的规律”,这种不能离“生”(生命、生活)而独立存在的“理”实质上是“生之谐和”;而理、生激烈冲突时的“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乃“为群之生而牺牲一己之生”,这是“古代儒家之最伟大的精神,而也是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精神”<sup>[4]</sup>。张先生充分肯定人伦之“理”的客观性与超越性,但否定有独存于“具体世界”或生活世界之外的“理的世界”或“共相世界”。“理”对现实的批判性与“理”的现实根源性相反相生,肯定“理”的理想性、超越性并不能得出“共相世界”之独立存在,也不符合中国哲学肯定“一天”或一个世界的基本精神。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李教授对“以西释中”的分疏与评断博综众见而持论平实,这既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贯彻全书的基本线索。“以西释中”或“反向格义”是“用西方哲学学说、思想、概念

和命题等来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实践”<sup>[1]164</sup>，这曾是现代学者们的学术共识、研究方法和主要课题，它一方面对“发掘、整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中国哲学特点和价值的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品质的提升”都有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带来“垄断了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扭曲了中国哲学的形象”“虚化了中国哲学的义理”“消解了中国哲学的精神与价值”等负面后果。在客观考察的基础上，李教授不同意简单否定“以西释中”，更反对对其情绪化指责乃至谩骂，而是主张建立“学术性的、客观的、正确的理解意识”<sup>[1]197</sup>以达到对“以西释中”诠释范式的公允评价。在他看来，“以西释中”只是“以西方哲学作为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方式、坐标或显微镜”，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明确主体在‘以西释中’中的责任”<sup>[1]237</sup>，可以预料“以西释中”仍是今后中西哲学互动对话的一种基本形式。此外，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哲学从业者的资质问题，肯定“包容心理”“忠诚品质”“怀疑态度”“独立人格”对理解和创新中国哲学的特别意义。这些真知灼见，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启迪。

李教授还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保持对过度诠释之警醒，“我们对任何文本进行诠释时，在展现思想自由的同时，应该注意其限制，即解释内容与文本的对应性，而且应将与原始文本不一致的解释告知读者。”哲学史诠释首先要探求古今哲学家的本意要旨，哲学史料的调查、鉴别、校勘、训诂、论次等文献学功底仍然是正确诠释的必要基础，如方克立先生提出：“我们在研究《周易》的哲学思想时，把《经》和《传》严格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把它们分别放在自己的时代中，分别解剖它们的哲学体系，才能认清《易经》和《易传》的本来面目，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规律解开一个重要的纽结。”<sup>[5]</sup>要“尽量”贴切地把握先哲之意蕴，还要有“同情地了解”。陈寅恪先生提出：要达到对古人立说之对象与用意的“真了解”，“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sup>[6]</sup>较早使用“诠释”一词的张岱年先生，也从其研究实践中体会到：中国哲学史研究要下“一番深求穷讨的苦工夫”以“领会古代思想之精旨”，“而能用清楚明彻的话，如其实的描述出来”，也就是要“用同情的态度，把古哲学家的思想再思想一过，因得探其精髓，会其幽微”，如此才能“不诬古亦不附会”<sup>[4]133</sup>。在规避过度诠释和随意诠释上，笔者赞同刘笑敢教授所说“符

合历史文献的可能允许的解释”是“对现代生活有价值的解释”<sup>[7]</sup>之前提，区划“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与“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取向”有助于促进哲学史诠释的严肃性、客观性与理论建构的原创性、时代性，我们应“先作忠实于文本的思想理论探索与开掘，再作如何将古代思想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尝试，并思考二者的关系是否可以由此‘转’彼，并‘衔接’起来”<sup>[8]</sup>。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三种模式的论争此起彼伏，贯串着“近(现)代化与民族化、世界化与本土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和张力”<sup>[9]</sup>，这提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张申府先生的“具体相对论”认为：我们应“把一切学说、理论的所见所蔽，当与不当，如何解则当，如何说则不当，在什么地方某种范围则当，在什么地方某种范围则否，都爬梳剔抉，陈示出来，以使各如其分、各得其所、各守其当”<sup>[10]</sup>。不仅各种诠释方法本身皆有其“分”“所”“当”，而且不同方法亦有其具体的适应范围和研究对象，各种方法之间应相映互补而力避相非相灭。吾友吕伟博士云：“原典如山，时代如水。”诠释是今人与先哲的对话，原典在照看着我们的思想成长。努力进入先哲的问题情境，通过“以意逆志”来“真切地把握……作品中已经或者试图表达的意义”<sup>[11]</sup>，是以中国哲学原典为基础而进行思想创新的必要前提。

该书由相关论文所集成，其自我呈现、理解方法、解释实践、现代身份和研究现状等五部分前后呼应而自成一体；同时，因篇幅所限，该书未能涵盖作者近年来的全部运思，如不仅未纳入对侯外庐、冯契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实践之考察，也缺少“儒学形态”“儒学开展”及阳明学研究等领域的新见解，后者最好与李承贵教授的《儒学的形态与开展》等著作参照阅读。虽然如此，我们对该书所包蕴的深刻问题和精湛分析，对其同情地理解之研究态度、平实地批判之思维特质和原创地建构之学术关怀，亦可稍见崖略。该书嘉惠学林，值得关心当代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各位同道细心赏读。

## [参 考 文 献]

- [1] 李承贵. 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 杜运辉编. 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下册)[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

- [3] 杨海文. 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4: 93.
- [4] 杜运辉编. 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上册)[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 384—385.
- [5] 方克立. 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M]//方克立. 方克立文集.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7.
- [6]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2卷)[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612.
- [7] 刘笑敢. 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定向[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1): 90.
- [8] 刘笑敢. 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82.
- [9] 方克立.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J]. 人文杂志, 2005(4): 6.
- [10] 杜运辉编. 燕赵文库·张申府集(下册)[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 9—10.
- [11] 杨海文. 孟子的世界[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263.
- (责任编辑: 蒋萍)

---

(上接第 97 页)

## Research on the Risk Measurement of China's Gold Futures Market ——Based on EGARCH-POT-VaR and CVaR

PENG Cheng-liang, HE Qi-zhi, DAI Xiang

(Schoo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00, China; School of Financ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olat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ld futures marke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EGARCH model, and measures the risk of the gold futures market based on the POT model of the extreme value theory and through the use VaR and CV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volatility of gold futures market returns can be well characterized by EGARCH model,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luster, persistence and leverage; (2) compared with EGARCH—N, the time varying VaR and CVaR calculated by the EGARCH-POT model is more effective and accurat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OT model enjoys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extreme risk; (3) the risk situation of the gold futures marke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slowing down, the partial shocking and violent fluctuation in individual days. Finally, we give relevant suggestions that the price limit and margin ratio can be dynamical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VaR and CVaR respectively.

**Key words:** Gold Futures; Market Risk; EGARCH-POT; VaR; CVaR

---

### 更 正

本刊 2017 年第 5 期中“东亚儒学文化的人文学科教育与比较人文学基础”一文的第一作者英文名应为: William Franke。特此更正。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